

东方文化丛书

佛典·志怪·物语

•王晓平/著



10
30

东方文化丛书

●主编／季羨林 周一良 庞朴

佛典●志怪●物语

王晓平／著



200080679



东方文化丛书

书名 佛典·志怪·物语
著者 王晓平
出版者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南昌市新魏路)
发行者 江西人民出版社发行
江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者 江西新华印刷厂
版次 199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90年12月第2次印刷
开本 850×1188 1/32
字数 27.8万
印张 12.5
印数 2001—5000
ISBN 7-210-00784-9/G·12
定价 7.20元

东方文化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编 季羨林 周一良 庞朴

编委 (依姓氏笔划为序)

方 鸣 乐黛云 李 锋 严绍璗

陈 融 钱文忠 魏常海

丛书常务副编辑 唐建福

丛书装帧设计 陶雪华

丛书版式设计 王玲云

本书特约编辑 刘 莹

《东方文化》丛书

总序

一部人类的历史，证明了一个事实：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前进。

既然讲文化交流，就必须承认，文化不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地区单独创造和发展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国家不论大小，民族存在不论久暂，都或多或少、或前或后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人类文化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全世界已经不存在的和现在仍然存在的民族和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文化交流则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统治今天世界的文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几百年中创造并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虽然已见端倪，但还没达到同资本主义文化分庭抗礼的水平。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没有辩论和讨论的余地。

欧美一些比较有远见的历史学家，比如英国的汤因比，从研究全部人类历史中发现，一种文化或者文明都有一个发生、发展、演变、衰退的过程。他们把过去的人类文化或者文明，分成了许多独立的个体。有的个体，比如美洲的玛雅文化，今天已经荡若云烟，不再存

DQ95/07

在了。有的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发展得如日中天，但是，哪一种文化或者文明也不可能万岁。

一种文化或者文明，怎样才能继续发展，继续前进，继续洋溢着生气勃勃的活力呢？关键除了内因以外，外因也起重要的作用，外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文化交流。哪一种文化或者文明，如果在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以后，就自我欣赏，自我感觉良好，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这表示，它已经失掉了生命的活力，注定要衰微或者消亡了。这也是一个历史事实，没有辩论和讨论的余地。

此外，根据我们的观察，在五花八门、纷然杂呈的众多的文化或文明中，显然有文化圈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在某一个比较广阔的地区内，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或者文明，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影响了周围的一些国家和民族，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积之既久，就形成了这样的文化圈。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从希伯来起一直到伊斯兰时期的闪族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圈，在非常辽阔的地区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圈内的国家产生了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影响。这影响不是单方向的，圈内的国家间有着文化交流，圈与圈之间也有文化交流，总起来看，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渗透的过程。

这样四个大文化圈，又约略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一个是西方文化体系，指的是从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的欧美文化；一个是闪族、印度和中国的东方文化体系。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这两大文化体系表现出来的情况依然是互相学习，互相渗透，交光互影，独立发展。这当然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是在最大的宏观的基础上的文化交流，而且这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三十

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一个文化体系也不是自一开始
就占据着或者永远占据着关键地位、主导地位、支配地
位、垄断地位。

在今天的世界上，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谈到的那样，
统治者是西方文化体系。我们东方国家——在这里，“东
方”既有地理含义，也有政治含义，即所谓第三世界的国
家——中国也包括在内，近几百年以来就是向西方学
习，向西方寻求真理。到了今天，世界上西方以外的哪一
个国家不向西方学习？哪一个国家没有西化？专就中国而
论，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文学艺术，甚至我们
的风俗习惯和我们的思想意识，无不打上了西方的印
记。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不向西方学习，则无法发展
我们的生产力，无法推动社会前进。这个学习我们一定
要坚持下去，不但今天学习，明天仍然要学习，决不能
稍稍放松。

但是，在努力向西方学习的同时，我们的头脑也必
须清醒，我们的眼光也必须放远。我们必须上下几千年，
纵横数万里，以人类全部历史和整个地球为背景，
来观察东西方文化的关系，这样才能看出两大文化体系
相对消长、互相学习的关系。最近几百年来所表现出来
的情况，只代表最近几百年的发展。前于此者，情况有
所不同，后于此者，情况也将会有不同。只有放眼观宇宙，
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观察问题。我们才能真
正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西方文化，了解东方文化，了解
中国文化。我们才能在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情况下，
准确地给西方文化以应有的地位，准确地给东方文化以应
有的地位，准确地确定我们文化发展的战略部署，准确地预
见我们学习西方文化的结果。

我们这一套《东方文化》丛书，顾名思义，就是想

给读者以有关东方文化的知识，帮助他们了解什么叫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东方文化中占什么地位、东方文化当前的作用是什么、衡以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的发展前景如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全国人民关心文化问题，是合乎规律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的这几个问题，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答案。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文化问题其中也包括东方文化的专著和论文。汗牛充栋，车载斗量，目迷五色，花团锦簇。我们想在这一面锦上再添上几朵鲜花，共庆升平。对目前注意东方文化很不够的情况，我们想加以矫正或者平衡。因为是丛书，作者很多，探讨的方面也很多，观点就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们认为，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们编委会对此概不干预。每个人的观点由作者自己负责。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文章达到一定高度的学术水平，材料又翔实可靠，我们就收入丛书中。我们希望真正能做到百家争鸣，而只有真正的百家争鸣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信念，也是我们的行动方针。

季羨林

周一良

庞朴

目次

——奈良平安时代的汉文「仿志怪」
第五章 语杂和汉 事涉灵怪 151

■ 浸润篇

——日本文学中的佛典志怪小说翻案
第四章 借枝坐普 汉材和用 111

——中日对佛典文学因素的容摄
第三章 梵章藻大和新语

——志怪容摄印度文学的特点
第二章 实虚相寄 奇正互叠

——佛经翻译中的印度文学
第一章 翠海移岳 引梵入夏

■ 导论篇

引言

——印中日三国龟报故事之异同

■ 第十一章 托语龟筮 发明果报

——《干将莫邪》与日本古代文学画廊中的复仇英雄眉间尺

■ 第十章 鬼雄猛志 强魂毅魄

——从比较民俗学看弃老、蛇婚、乱宫母题

■ 第九章 僧俗情貌 士女风姿

■ 潮游篇

——《今昔物语集》与中国佛教文学

■ 第八章 取彼一核 化育万千

——《今昔物语集》中的中国物语

■ 第七章 史怪并采 梵奏同炉

——中国志怪小说和日本怪奇文学源流

■ 第六章 阴阳为炭 造化为工

■ 参考书目举例

■ 后记

——日本近代作家对志怪传奇的新视角

■ 第十四章 貌同神异 脱胎换骨

——中国志怪小说影响在日本文学的扩衍与延展

■ 第十三章 翻雅为俗 舍旧谋新

——中国经史叙事文学对日本物语文学的浸润

■ 第十二章 质实尚精 饰虚缀奇

303

326

364

387

389

■ 潜海篇

引言

五“四”以来的许多前辈，都曾以打破文学研究的封闭状态为己任。他们把中国文学放在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大环境和大潮流中，览察文学发展的历史动向，探寻中国文学的特征和发展的独特规律。他们对中国文学有繁深的根基，对国外文学有深刻的理解，因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现象的剖析便显示出恢宏的气度、广博的视野和见微知著的目力。他们为我们这些后来者留下的，不仅是高深的学识、谨严的学风，而且更有高瞻世界、远瞩未来的气魄和追求真理、追求科学民主的精神。

今天，世界已以前所未有的慷慨，把自己的面貌展露在我们面前，而我们探索世界、拥抱世界的渴望也比任何时代更为强烈。文学研究中的自我封闭，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会使我们对过去时代本来互相联系、殊途同归的文学现象视而不见，对文学传统的认识也会陷于僵化，因而，继续前辈的工作，认真清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应该说已经提到我们中国文学史研究工作的日程上来了。

由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和与西方相距遥远的地

理环境，我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直接联系姗姗来迟，在很长时期内几乎处于不闻声息的隔绝状态。在漫长的岁月中，我国文学创造了自己悠久的历史、厚重的传统和独特的文学思想。但是，在一千几百年以前，我国文学便曾与印度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通过它，隐隐约约地感应到更加遥远的地区与民族的文学信息。同时，中国文学也曾以它使用的有深刻文化背景的汉字为纽带，在东北亚、南亚的广大地域获得广泛的传播，并把已经中国化或部分中国化的印度文学，传播到那里。其中正处于文学开发突进时期的日本民族以其追赶超越先进文化的勇气、旺盛的好奇心与模仿欲，迅速地容摄了大量有利于本民族文学发展的因素。印度、中国、日本这一段文学因缘，长达数百年，在当时世界文化交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是东方文化富有迷人光彩的篇章。中国、日本将来自异国的异质文学选择性地吸收到本国的文学肌体中，化为传统的一部分，构成了各自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内容。

中古时期各民族文学的发展和联系，是与宗教的兴起和传播分不开的。在中国，有儒释道的融合；在日本，有神佛的调和。日本从公元6世纪到8世纪是佛教文化时代。起初，统治者将佛教作为统一民族、建立和巩固中央政权的工具，而后，又把佛教作为与中国直接交流的先进文化的一部分，以建设烂熟的贵族文化，最后，原有的信仰神教与佛教调和在一起，给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以巨大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佛教故事和中国志怪小说大量翻译仿作，与佛教有关的物语相继问世，终于形成了印度、中国、日本宗教文学大汇流的局面。

宗教把“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马

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218页）。佛教故事、志怪小说和日本的物语，不少宣扬了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修行解脱、佛力无边等谬说，剖析和批判其中的唯心主义毒素，是我们古代文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任务。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们在几百年内存在并发生过种种作用，应当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同时，佛教徒或笃信佛教的文士挖空心思地搜罗各种材料来附会义理，常常是贪多务得，巨细不捐的，那些神话、童话、寓言、传说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既有前代遗留下来的历史材料，又有采自民间的口头文学，许多是由于人类思维的共同规律而存在于世界各民族中的相近主题，与佛教教义毫不相干，当它们被用于宗教目的时，便被改纂、曲解和增饰，而其本来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蕴便被抹煞和掩盖。当它们通过佛典在各国各民族间流传的时候，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又采取着不同的接受方式，各有所保存，又各有所舍弃，变形移神，度以己意。佛典故事、志怪小说和日本的物语，同样与佛教的流传有联系，但由于各自的文学风格不同，其反映的社会生活、思维方式和接受心理又千差万别，这些都为文学史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提出许多耐人寻味的问题。

神话与历史在印度、中国、日本文学中处于不同的地位，这正是三国古代文学最有代表性、最鲜明的差异之一。在中印之间，这既是中国文学能够利用印度文学以充实自己的条件，又是现实性思维发达的文士对其采取某种抗拒态度的理由。明人胡应麟曾说过：“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变之说；齐梁弘释典，故多因果之谈。”（《少室山房笔丛》卷第二十九）印度式的幻想，对中

国志怪小说中的鬼怪世界、神仙世界、精灵世界、幽冥世界、龙宫天堂世界幻想的立体构筑，具有催化与赋形的功用，而迫于经史叙事文学的重压，志怪小说又很晚才去模仿佛教故事放慢叙述进度、类聚平列结构和多用直接语气等平民式的叙述方式。与此不同的是，日本后起直追的文学表现出兼容性与活泼性，在对中国文学抱有畏敬崇拜心理，积极采纳中国志怪小说的新观念和新主题的同时，表现出对幻奇境界的极大热忱，什么狐淫蛇乱，什么仙来神往，什么易卜相术，稍一变样，即为已有，一部《古事记》更是充满夸诞的神话。纵观中日文学交流的历史，佛教的影响在儒教之上。这首先是由日本文学的社会历史背景、创作和接受文学的阶层、传统内容与形式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而解开其中的奥秘，或许恰可找到某些中国作品在日本流传或未能流传的原因。

在印度、中国和日本文学的大汇流中，六朝至唐宋的志怪小说具有递接转换的功绩。它的国内文学意义在于与笔记小说一起，使小说从经史叙事文学中分离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开启了一种以非人世界来扭曲地反映或讽喻自然、人生，特别是人的心理世界的表达方法，为后世戏剧小说提供众多的基型和独特的幻想方式，在由经史叙事文学的不弃轶事传闻、捕捉现实生活中的奇情异态发展到神鬼狐妖自成艺术世界的过程中，在由经史叙事文学的悬想事势、拟言代言发展到虚构境地、臆造人物的过程中，在由经史叙事文学的勾勒梗概、步步暗示发展到细摹情态、精绘形神的过程中，志怪小说都起过奠基的作用。而它在国际文学交流的意义，则在于它将佛典中的印度文学与传统思想趣味相一致或相吻合的部分，中国化或部分中国化，自身也有一

部分成为日本怪奇文学的原始材料、仿作范本和异国先导，丰富了那里的佛教说话的内容。

东方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过程具有一致性和规律性，而这一过程决定着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学艺术合乎规律地发展。在没有直接的相互影响和接触的情况下，各国各民族便有着基本相近的神话，而在由神话转化为神奇怪异故事的过程中，虚构意识的增长是必备的条件。在中国，早期小说只能站在叙史叙事文学的肩膀上求得发展。汉代的五经实际上包括了诗歌、哲学和历史散文，其中不乏叙事的因素，而秦汉以来的史传，叙事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志怪小说被视为“史之余”受到务求信实的原则的束缚，在承认鬼神实有实存的基础上，事资虚饰，暗中扩大虚构的范围，在史有异说的缝隙中，争取虚构的合理性。它们文字简约，读来象是故事的大纲，阅读的趣味一方面是人事的怪异，另一方面依赖读者充分扩充想象来补充作者叙述的大量空白。本书采用“经史叙事文学”的概念，正是为了突出说明我国早期小说发展区别于东西方各国小说的这一重要特点。在志怪被译成日语的时候，所包含的道德教训被沉淀，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往往被稀释，甚至时空都被模糊化处理；相反，佛教气息变浓，描绘性增加，通俗化更鲜明。它们还常常被改写成发生在日本的故事，原作中的官僚文士、征夫恩妇变成日本的渔夫山民、僧尼武士，并多融入日本的传说或与日本的历史事件、风土人情结合在一起。

本书以佛典、志怪、物语为研究对象，为此有必要对这三个概念作一些说明。佛典，即有关佛教的书籍——我着重探讨的是里面的故事——它既包括汉译的经、律、论，也包括中国人编辑的《经律异相》、《诸

经要集》、《法苑珠林》等佛教类书。这些书籍，卷帙浩繁，义理艰深，其中的神话传说、童话寓言异常丰富，与《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五卷书》、《大故事海》等印度古代文学作品同源或相近的故事散落其间。许多重要的佛教文献赖汉译佛典而保存下来。日本对佛教的接受，并非“直餐梵响”，而是通过汉译佛典的媒介进行间接接受或二次接受。中国的译经者在翻译中无疑注入了自己的理解。

志怪是与传奇相对的概念，是以描绘鬼神怪异为内容的作品^①。事实上，传奇也曾受到佛教的影响，陈鸿《长恨歌传》中方士“游神驭气，出天界，没地府”、“极天海，跨蓬壶”的寻觅，裴铏《聂隐娘》中的转世报应之说，它们与佛教的联系，前人早有笃论^②，相比之下，六朝至唐宋的志怪与佛教关系更深。从主题学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就对日本佛教文学的影响而言，首先应当提到的也是志怪。我的研究以志怪为主，略及传奇，在书名中只言志怪而不言传奇，只不过为了简省而

①明人胡应麟说：“一曰志怪：《搜神》、《述异》、《酉阳》、《宣室》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

②例如，刘开荣《隋唐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上篇第一章对比了《孔雀东南飞》与《长恨歌》，指出前者是魏晋间没有佛教色彩的作品，后者是中唐时深受了佛教影响的作品，二者在思想的范围及想象力的大小上的分别，是非常鲜明的。“可以说在想象方面，增加了一个极宽阔无垠的境界，在布局方面，也多了许多美丽夺人的穿插。这不能不说这是佛教文学的赐予。”近人的研究如陈允吉《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兼述〈长恨歌〉与佛教文学的关系》（载《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对比了《长恨歌》、《杂宝藏经·优陀婆罗王像》与《欢喜国王缘》，具体指出：“《长恨歌》加工提炼的这个风靡一代的民间传闻，竟有绝大部分情节内容是在附会《欢喜国王缘》的基础上形成的。”